

# 《人间词话》中的悲观主义哲学观

王 靛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 100000)

【内容摘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谓文界一奇葩,汇通中西学术,用传统词话形式总结出极具哲理性的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地位极其崇高。本文从意象说、境界说、出入说角度对《人间词话》略做哲学分析,阐述词话与叔本华悲观哲学的联系。

【关键词】人间词话 悲观哲学 境界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6-0097-02

王国维(1877-1927),生活的年代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冲突、各种学术思潮、人生理念风潮迭起的时代。他“体素羸弱,性复犹豫”,这样的性格基质遭遇多难的时代,使得他一生“忧生忧世”并进而不断地去探索人生的困惑处以求心灵的安慰宁静。此中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学无中西”的学术文化观。他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历史、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在对人生所起的作用上两者是一致的:“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则一也。”<sup>[1]</sup>《人间词话》这本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本词话著作便是这一学说的明显例证之一。1898年甲午海战后,王国维“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开始接触了解康德、叔本华哲学并对后者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好之”,称其“思精而笔锐”。此后更广泛涉猎叔本华的其它哲学著作。

叔本华悲观主义唯意识论哲学很契合“性复忧郁”的王国维的品味爱好,并对其此后的人生观、文学观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精神》、《文学小言》等都是运用叔本华美学理论来讨论中国文学问题的名作,而《人间词话》更是此类作品中的翘楚之作。

《人间词话》堪称王国维生命底蕴的流露、思维深层的外显,是作者对宇宙与人生、生命与死亡等基本人生问题的探问和思索的心力结晶。与传统诗词最大的区别在于开始摆脱传统的伦理世情,如离别相思、宠辱升降的限制,进入一种哲学视界,对人生进行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艺术表达。整本词话随处可见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观的浸染痕迹。以下笔者从意象观、境界说、出入说这三个方面简析词话中的哲学关照。

## 一、“人间”意象中的哲学观

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能使读者通过想象和联

想,如身临其境,在情感上受到感染”,是高出形象层,具隐喻性、符号性的体系。其始源可以上溯到《周易·系辞》中的“圣人立象以尽意。”是读者吟诗后“心有戚戚焉”进而在诗歌营造出的、独立于尘世之外的情意境界中或悲或喜的本源所在。自然意象多是肃霜秋风、老鸦孤雁、残霞落花,基本主题是人间难凭、人世苦短难思量。并且这不是片刻失意落魄后的自怨自艾,而是王国维对宇宙人生一贯的哲学态度和艺术感觉。

王国维在诗学阐释和文学创作中一直把生命视为最高的存在本体,而生命存在就和文学创作中一直把生命视为最高的存在本体,而生命存在就是苦难岁月的结晶,如叔本华所认为的那样,人生即欲望即痛苦,作为世界本源的意志是一个无尽追求,欲望满足后的无聊与欲望未曾满足的苦恼如钟摆一样折磨着人生,而要想摆脱欲望生存的羁绊,就必须具备天才明亮的世界眼,通过对艺术的纯粹直观达到获得永恒理念,但纯粹观审毕竟只是瞬间的慰藉而非永恒的驻足,人终归要回到根据律所支配的世界之中来。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核心就是“忧生”,“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望与生活、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厌倦之间者也”,这些认识可以说直接来自于叔本华的理论。王国维之所以用“人间”二字来命名自己的词学和词作,就在于他感悟到了其中的哲学真谛,从而“静观人生之变,感慨系之”:

人生只似风前柳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

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水龙吟·杨花》

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

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

红颜随时光而逝去不存,花朵凭诗节而凋落不在,这是

\* 作者简介:王靛,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小说与诗歌、文学比较。

人间的自然规律。悲欢有时,哀乐有时,都是人生难免的际遇。承载着浓厚的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气息。在人间、人生的意向表达层面上王国维认为《诗经·节南山》“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表达了“忧生”之情,欧阳修“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阳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与豪放中有沈著之致”,说“少游词最为凄婉”,甚至对那些直抒生命忧患意识的诗词颇为喜好,如“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认为其真实地表达了情感而不显矫揉之态。王国维说姜夔词“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白石有格而无情”,认为姜夔词虽然清空峭拔、格调高雅,但是缺乏生命的历练和对人类生命情怀的深沉透视,缺乏深切真挚的情感抒发和鲜明生动的形象描绘,因此不配进入“第一流作者”的行列。由此可见,王国维好像更强调客观的阅世,强调词人应该在人间尝遍命运艰辛带来的苦难体验,文学应该艺术地传达这种生命本真的价值情怀。王国维推崇北宋之词而贬抑南宋,就在于他认为北宋词人更多地表达了对人生命运的思考。

## 二、境界说中的哲学观

“境界”二字原自佛经,中国自唐朝起开始用“境”、“境界”论诗,到明清两代变成文学艺术的普遍用语。王国维对此的定义是:“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而在境界说中哲理意味最浓的便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提出。王国维认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属于“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万物皆着我之色彩。“有我”不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而是指“我”的意志尚存,且往往是“外物大不利与人”时所得的一种境界。叔本华认为审美主体在“经强力挣脱了自己的意志及其关系而仅仅委心于认识,只是作为认识的纯粹无意识的主体宁静地观赏着那些对于意志可怕的对象,只把握着对象中与任何关系不相涉的理念;而“无我之境”,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等指的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境界。与叔本华所说的“按一句有意味的德国成语来说,就是人们迷失于对象中了,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知觉这一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离开了,而是两者

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觉景象所充满,所占据。”<sup>[2]</sup>同一而足。

根据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人莫不有生活之欲,受意志之支配。只有灭绝意欲才得解脱。而灭绝意欲又岂是易事。于是出现了难易高下之分。从这一视角出发王国维认为“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即中国诗词界写有我之境者多于无我之境。

## 三、“出”、“入”说中的哲学观

上文所涉的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此外,王国维还对作家的素质、能力、观察生活的方式等提出了自己哲思性的看法。他认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需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里的“入乎其内”指的是要对“宇宙人生”做深刻而细致的观察,以积累丰富的材料对生活做翔实可信的描画。而“宇宙人生”的本质是由叔本华《作为表象与意志的世界》中的“意志”转化而来——生活者非他,不过自吾人之知识中所观之意志也。“出乎其外”则指的是摆脱生活之欲,忘掉物我关系,从而对审美对象进行静观,创造能给人心心理慰藉与解脱的艺术美。

王国维虽推崇能入能出之境,并身试之,但事实上审美的超越之境与其说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世生命境界,不如说是一个屹立于终极之巅的精神乌托邦,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折射到王国维本人的生命遭际上,他在动乱的时代试图既入乎其中,生存发展,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溥仪被逐后王国维视之为奇耻大辱,欲投御河自尽未遂,又试图超乎其外,去研究国学,试图脱离社会纷扰领会世间流转变化的因,终末却未能躲过悲观主义理论的“空无”陷阱,在北伐军直逼北京时固守清元老情节,留下“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书,跳昆明湖自杀,为整个人生画了最后的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

《人间词话》的意象说、境界说、出入说这三个层面都渗透着叔本华哲学的色彩。中西理念交映下,词话的哲理光芒与文艺审美光芒并举,堪称文坛不败的奇葩。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

[2]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1982.